

# 导论 · 中华民族与文明的复兴

## 1 主题的追思

《东方的复兴》这本书主题 是试图比较全面和系统地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起源、目标、困难、问题与前景，以及这一进程对于第 21 世纪人类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写这本书 首先是为了澄清我个人近年思想中的某些困惑。但另一方面，这本书的题名在 15 年前已经确定——要写这样一本书，又是来自我个人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其最初形成，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中的 1974 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继 1964 年于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现代化”的问题的 10 年之后 再度提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命题。当时有些人就已经意识到，这次会议和这个目标的重新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意味着时代精神的一种深刻转变——“文革”作为一个时代的即将终结 而且深刻提示了在“文革”后的新时代中，中国社会将面临的一项重大的长期性主题。

当时我虽然僻处穷边，但这一主题却深深地激励和振奋了我，引我思索。我如同拨云驱雾一般从当时尚硝烟弥漫的“文革”风云中，豁然意识到一个崭新历史时代即将到来。

恰好其时我正在阅读斯宾格勒写于本世纪初的名著《西方的没落》。此书风格怪诞、神秘、夸张，充满了关于人类历史非常富于主观性和玄学性的唯心主义幻想。但是尽管如此，在深入阅读之

后，我仍然意识到这是一部才思横溢的著作。

重要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若干基本意念，意为 20 世纪后来的事变所证实。特别是他的西方文明将走向没落的预言，在 20 世纪的晚期，已经愈来愈清楚地显现在当代历史中（对于这一点，国内某些为西方当代的富裕生活和高发达科技表象所迷惑的朋友，可能还会表示怀疑。但是，许多当代权威的西方学者却根据统计材料而并不怀疑这一点。实际上，当代西方人对于日本、中国和亚洲新兴地区的高度关注、重视、戒心甚至敌视，正是来自对于西方没落和东方复兴这一历史潜在趋势的深刻忧虑和关注）。

虽然我当时的哲学背景、理论和知识水准，使我远不具备把握这一重大主题的能力。但是，我还是试图紧紧地抓住它。在其后多年的时间里，我不断地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不同的学术角度，反复追踪思考着这一主题，就是：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机会，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经济和文明群落，能够获得一种伟大的、将给人类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复兴？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的话，那么将其转化为现实需要具备哪些精神和物质条件？

在历经 15 年沉重而痛苦的探求和思索之后，对于这一历史趋势，我具有愈来愈强烈的信念和愈来愈清晰的认识。因此，我现在向读者献上这部著作。

## 2 东方将走向复兴

东方将走向复兴，最早预感到这一重大历史主题的思想家似乎正是列宁。他在生前所写最后一篇读书札记中，思考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时，注意到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由恰处于东、西文明交汇处的俄国，向东方的中国和东南方印度的传播。他指出，在这些人口无比众多、国情无比复杂的东方国度中，这种革命

无疑将具有某些更独特的意义。

对塑造 20 世纪现代中国的两位历史巨人孙中山和毛泽东来说，复兴中国和东方，不仅是一个被确认无疑的信念，而且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系统而清晰地规划了这一目标。而毛泽东，当他在建国之初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他无疑确信这将是中华民族乃其文明走向复兴的起点。

我们特别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具有宏大超人的地理战略眼光。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他没有把这一革命的意义仅仅局限在中国自身之内。相反，他的目光马上投射到朝鲜、印度支那及其周围的泛东方地区，甚至更进一步越过这个地区，而扩展及于整个“亚非拉”地域，后来发展成为他 70 年代中期所阐述的“三个世界”斗争的概念。

实际上，正是由于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在五六十年的国际政策和实践，才根本改变了雅尔塔会议上超级大国试图强加给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战略形势和大国利益分配地图。正是毛泽东引导了 20 世纪的中期亚、非、拉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毛泽东以无比的英勇气概和历史智慧，对超级大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且确实对之形成了深刻的战略威胁。他使 50~70 年代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获得了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战略性地位。正是毛泽东赋予当时的第三世界以一种战斗性的思想意志，从而深刻影响了将近 30 年中的世界历史潮流。

在 1959~1960 年间的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毛泽东注意到世界革命中心于 19 世纪以来由西方欧洲向东方转移的进程。他要求 60 年代的中国承担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重任。甚至他之所以发起失败的“大跃进”和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相当重要的意义上，也都正是为了自觉地呼应和实现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使命。

然而，形势毕竟比人强。作为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毛泽东那些富于创造性然而却脱离了现实的经济试验和政治宏图，并未

一一如愿。但是，由于毛泽东具有伟大、深刻而超越历史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他的许多历史预言，却仍然以人们所未曾预想的一种新情况而在当代经济、政治的现实中得到深刻印证。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所关注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和东方作为政治巨人的崛起。然而对于当代世界来说，一种更有力的现实，却是东方地区作为经济巨人的崛起和振兴。一方面，日本和所谓“旧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新四小龙（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太平洋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当代异军突起，其实力、潜力与势头，已对美、欧诸传统强国形成日益有力的挑战。

另一方面，40年来尽管不断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重重经济、政治封锁与遏制，尽管充满失误与挫折，尽管困难重重、矛盾重重，甚至今日潜伏深刻危机，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革命仍然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成功。就中国综合的总体国力看，在多方面实际已经达到中等强国的水平（本书中有详细数字及比较）。

事实上，在今日世界中，没有任何地域的经济比东方地区更富有朝气、活力和潜力，也没有任何地域像东方这样蕴藏着丰富的人力储备、资源储备、资金储备和待开辟的市场空间。

近40年来，自地中海东翼到太平洋的广阔近东、东方和远东地区，取代16~20世纪前半期近500年内的大西洋、地中海西翼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主要焦点和舞台。正是东方经济、政治在二次大战后的崛起，主导和牵引着40年来的世界性变革潮流。毫无疑问，这一地区也势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竞争和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地区。

对于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有待开拓和不断重新认识的新大陆。尽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至今依然阻难重重，但是，从古以来的中国历史都正是多难兴邦。如果我们回顾自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以来，直到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无数当代志士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代接一代的爱国者为了这个民族的独

立、富强、振兴和现代化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不仅会惊讶这一历史所具有的惊人连续性，而且会惊讶中国人的如此坚韧不拔！我们更会意识到，追求富强和文明复兴，既然已经有五六代人为之披肝沥胆、前仆后继，既然已经是席卷和涵盖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主题，那么，它就决不会被今后的中国人所真正放弃。不管还有多少曲折、险阻和疑难，中国人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时，是决不会后退的。

东方在复兴 中国也必须复兴 而为了实现这种复兴 首先必须追求中华民族精神、斗志和信念的复兴。这一点，也就是本书所欲紧紧抓住的一项最重大的基本主题。

### 3 并非“危言耸听”

本书的初稿在 1989 年的动乱之前曾经写就，并在海内外若干杂志上发表过其中的部分篇章。但一年前写此书时，我还怀着对于国运民生的一种深沉忧虑——因为坦率地说，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赵紫阳先生若干经济政治方略的严重偏误。因此在本书原稿中，我坦率直陈了对赵政策的某些批评意见。我当时还曾经预测，如不扭转其偏差，中国很可能将会陷入大动乱和国家分裂的危亡局面。

同时我还曾警告：中国现代化这一经济政治目标始终与若干超级大国谋求世界性经济政治霸权的战略利益相矛盾。当世界是两极分化时 某一超级大国可能会谋求打“中国牌”借助中国以图牵制对手。但随着世界多元化趋势的加强，传统超级大国实力地位的下降 国际战略形势重新组合 打“中国牌”现已不如 70 年代那样重要。因此，某些西方大国近年对中国改革所实施的战略方针，始终是谋求以中国为战略工具，口蜜而腹剑。其最终战略意图，从根本上说，是延滞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甚至致中国

解体破碎分裂之局（直率不讳的“中国解散论”、“300年殖民地而后现代化论”以及似乎较富学术性的改造中国为“联邦”或“邦联”论等等——实际就是主张中国实行分土裂国的新“封建论”无论其言者是否自觉，其源却盖出于此。实际间接充当着超级大国在中国实现其战略意图的工具）。最终目标，则是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在未来成为其强大经济政治对手这一隐患。

但遗憾的是，我当时的批评和警告并未引起重视，还受到了“智囊团”中某些人的公开敌视和批驳。此外，今年4月初动乱发生前夜，我所在部门的一位领导也曾善意地转告我，很接近赵的某智囊人物指责我的议论“危言耸听”，要我注意。然而不幸的是我对动乱的某些预测在1989年的动乱中竟得到了局部的证实。

平定动乱后，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本书初稿中针对当时某些特殊政策和失误的分析和批评，现在也已不复必要。所以在这部新稿中，我把主要注意力集中研究有关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的某些更具有基本意义和普遍性的问题，在内容上作了重大调整。只是我仍然把我在1988~1989年初发表过的几篇原稿附录于书后，供有兴趣的读者分析、参考。

## 4 民主概念的剖解

1989年的风波后，知识界某些朋友写信质疑我对于这次动乱所持的反对态度。本书在理论上对有关的质诘有较全面的答复。

此次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几乎把中国推到内战、分裂和灾难的边缘，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但也与多年以来某些流行时髦理论对于近代西方历史、对于中国传统文明和当代现实估价失当，对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目标等理论问题见解偏颇，以及此类偏

见对社会误导 具有密切关切 。

兹以民主问题为例。实际上，中国古典社会，绝非如某些极端反传统者如《河殇》派所说“只有专制制度而没有民主意识”或“只有奴性而没有人性”。如果注重实质而不是简单考虑形式，我们就会注意到，民主在中国，也曾具有其悠久而深刻的传统。

在《尚书》、《左传》等远古经典政治文献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自尧舜传说时代至于春秋，中国曾存在过氏族民主与贵族民主的古老政治传统。而在儒家的若干经典文献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大量关于“贵民轻君”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具有强烈民主色彩的政治议论与教诲。

问题在于，这种政论和教诲，远非仅属欺人之谈或不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盲目说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些政治典训不仅教化出了无数为国为民，敢于以匹夫之志抗命强权的仁人志士；而且作为一种实践的政治理论，也形成了在古代限制君权、抑制官吏特权、表达民意和公众政治批评，如著名的“谤木”、“设置”、建议、规劝、弹劾、监察，以至合法废立皇帝“禅让”的一整套相当成熟而具备若干基本民主功能的法制、政治制度和传统。

这一套制度，之所以说是成熟的，因为它几千年历史中是在不断被改进和完善的。当 17 世纪自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康熙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介绍给法国路易十四这位当时在欧洲享有“太阳王”之称的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时，这位“太阳王”对中国君主制下仁慈明哲的统治方式极口赞美，甚至试图研究和引进之。我们不要忘记，17 世纪欧洲已经进入所谓“启蒙时代”（中国文明对于欧洲“启蒙”事业发生过深刻影响，正如中国四大发明对于近代西方技术发生过深刻影响。这一点，研究当时一些传教士和启蒙学者

我近年的探索中，虽然始终坚持反对“现代化即全盘西化论”（可参看《何新集》），但某些议论难免亦会有所偏颇，本书可以体现我对有关问题所作的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但可惜而惭愧的是，我们当代人却往往数典而忘祖）

在古代中国 固然没有希腊式的议会民主制度 但绝非根本没有‘民主’性的概念。中国古代的民主 也许更注重的是实质而不是形式。事实上，如果不曾发展一套能够适当吸收和容纳民众意志、在一定限度内承认臣民的权利政治制度和机制，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朝代就不可能延续那样漫长的时间（秦、隋、元等少数几个皇朝，武功强大而滥用暴力，正是由于政制中缺乏民主机制而暴亡，则恰是反面的例证）。实际上，古代中国人并非真是那样易于统治的愚民、顺民。故雄才大略如唐太宗者亦曾自诫：为政者当常思水能载舟亦能覆之。与沉湎于宗教狂热中的中世纪西方人相比，也许当时的中国人反倒是更富于批评和反抗精神，而难于治理的（所以中国历史中的平民起义就远较西方中古历史中次数为多）。

当然 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形式 中国需要借鉴。但是 这种借鉴不应当是全盘照搬。中国有自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故中国的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应当首先从总结中国历代和当代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出发，同时也参照借鉴西方经验和形式，以政治稳定和发展经济为前提，循序渐进地推进。否则，就必致社会于动乱。

具备西方的形式民主制度 不是、也不可能是权衡一切社会民主真正程度的唯一和绝对标准。事实上，照搬和模仿西方多党政治以及议会民主制度的道路，中国在本世纪初辛亥革命后摹拟欧美制定的宪法中，在北洋政府的宪政时代以及蒋介石时代修订的民国宪法中，都曾经多次尝试过。但由于完全不合国情，结果弊端百出而终致失败。

后来 国民党在台湾多年并未实行多党议会民主 在近期经济起飞后才开放‘党禁’。日本明治维新后 虽然在政治法制的诸多方面借鉴西方，但始终并没有全盘照搬西式政治民主制度；直到当代，虽然议会中有多党参政，但长期也是自民党一党执政。香港政

治虽然是英国在治理，但并未照搬英国政制，因而素来以“有自由无民主”著称。韩国、新加坡也都没能模仿美、英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由此观之，亚洲诸“小龙”虽实行资本主义，却也都并不照搬西方一切政治制度。

由此足见，西方式民主制度既非一切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道路，也并非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发展所必须的政治前提条件。若必以二者为因果，则首创西式民主制的古希腊、近代较早建设议会民主制的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即都应当最早成为现代工业化强国。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谬以为，衡量现实中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好与坏，标准仍然应当是实践。在设计和构造任何制度的改革方案时，首先应当考虑多方面的社会客观条件。

只有在实践中，有利于一个社会稳定、同时能够促进经济和生产发展的制度，才是有利于这个社会和人民的一种好制度。反之，就是坏的制度。甚至斯宾格勒也说过：“理解世界就是要紧跟世界。最重要的是生存的严峻现实，而不是唯心主义的鸵鸟式哲学所提出的关于生活的理想式观念。”

## 5 历史的新起点

自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为国家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本世纪中叶 1949 年中国革命成功，新中国建立，这一事件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尤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结束了持续百年的动乱局面，恢复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彻底驱逐了凌辱中国已达百年之久的西方列强，从而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奠定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9 年的动乱中，“5.17 宣言”的作者对 1949 年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意义，却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他们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直截了当地使用了“专制制度”和“封建社会”这两个术语。

虽然这种“新”观念不作任何掩饰地公然被推出，是在此次动乱中。但实际上，这一理论的酝酿和产生，却由来已久。

回顾 1978~1989 年 10 年中的中国社会思潮，“反对现代封建主义”可以算是政治方面最走红的理论热门之一。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在批判“四人帮”时提出了“重新反封建”的提法。这种提法在当时条件下，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和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就理论性而言，这一提法却是低水准和含义模糊的。

不久就有人进而提出批判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sup>①</sup>。这个提法本身就隐涵术语的魔术。人们知道，封建主义是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所谓“农业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实质就是“封建社会主义”。只是碍于政治原因，当时还不能如此赤裸裸地提出罢了。但是通过“农业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规定，中国 1949 年以后构造的当代社会制度，就已经从经济基础上被巧妙地定义为“实质上的封建制度”了。在这种理论定性和导向的基础上，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际目标自然应该是资本主义（故也有人十分直白浅显地公开讲过：“资本主义虽然不好，但它总比假社会主义和真封建的当代中国制度好”）。

继之出现了以《河殤》为代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请注意《河殤》所谓“反传统”并非是指抽象的中国文化传统，而正是被论者认为一直延伸到当代的中国封建主义传统。大致同时，当代社会思潮中又有所谓“新启蒙派”、“未来派”等等流派相继出现。其论者或以“五·四”反封建精神的真正传人自居，或以 18 世纪法国革命前夜的启蒙哲学家如伏尔泰、卢梭式人物自命，或以狄德罗、

<sup>①</sup>正是毛泽东本人曾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潮，见薄一波《若干决策与重大事件的回顾》。

达兰贝尔式的“百科全书派”相许。总之，群起而模仿法国 1789 年“中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进行舆论先导和鼓动的那一代哲学集团。而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当代中国也发动一场“彻底推翻现代封建制度”的“第二次革命”。

这些论者认为，当代中国之所以必须进行这一革命，不仅因为“五四的反封建运动是不彻底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而且因为 1949 年的革命，“超越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历史必经阶段”，其结果导致了“封建制度在社会主义外壳下的复活”。上述观点通过 10 年之间的发展、宣传和普及，最终果然付诸实践，成为此次社会动乱和暴乱的直接理论基础。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会出现两次：第一次以悲剧出现，第二次以笑剧出现。在法国革命已逾整整 200 年后的中国，居然仍会出现拙劣地效法这出旧剧的一群认真模仿者，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令人不能不惊讶于当代人在精神和政治上的贫乏。但另一方面，冷眼观察，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人们如何“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sup>②</sup>——但实质上却又是那样地文不

中产阶级，是近年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论者以此替换“资产阶级”这个意义相同的旧术语，以免招致民众对后者的反感。但究竟何谓中产阶级？美国学者 R. Palmer 有一经典论述，大略如下：“中产阶级，源于法语布尔乔亚，与英语自治城市的市民同义。这是一个范围不太明确的阶级。通常泛指中世纪城市中形成的非贵族和非被雇工者的一切自由身分者。例如城市名流、政府官员、商人和其他有产者，也包括教士、知识分子和其他自由职业者。马克思则用此词专指资产阶级。”（R. Palmer《近现代世界史》，可参看中译本，P. 15。由此观之，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在古代、近代实际早已存在，并不需要特殊地去“创造”。然而近年某些论者动辄宣称“中国改革若欲成功，必须构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据说还有“智囊”建议，在改革中先构造以企业家为主体的一个中产阶级，用他们去和工人阶级相对立，政府则居中调节平衡等等。万润南称自己（1989 年）动乱是一次中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运动。这类论点，实际既未明白何谓“中产阶级”，也不明白中产阶级在欧洲究竟如何发生作用，而不过是出于浅妄历史比附的皮相之见。但在近年，却竟都曾轻率地被付诸于经济和政治的实践。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P. 1。

对题，却也着实未免令人喷饭。

中国今日的社会实质和社会阶级，究竟是不是仍然落伍地停滞、徘徊于“封建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它的解答，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前途，关系到新的动乱在中国是否还会以“反对现代封建制度”的名义而再度发生；更关系到每一个人在当代和未来政治斗争中的立场抉择。因此，很值得认真作一考辩。

## 6 概念的本义与误用封建

所谓“封建制度”就此一名词在汉语中的本意而言，原是指封土建邦，小国林立的诸侯割据局面。而在引申的意义上，则是指建立在土地、地产私人占有基础上，实行皇权君主制的传统农业社会主义形态（《河殇》派一面宣称传统中国没有形成过“私有制”另一方面却又侈谈其“封建性”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试问若没有地产私有制度，又何有封建主义可言？）

在西方语言中，汉语“封建”一词的对应语是“Feudalism”和“Lehnwesen”。前者指欧洲中世纪那种农奴对领主、武士和封臣对诸侯的人身臣属关系<sup>①</sup>。后者指封土采邑制度，语义接近中国“封建”一语的本意。

以“封建制度”这个概念的上述诸意义观之，无论就这个语词的本意还是引申意义来衡量当代中国社会：

第一 从经济基础看，当代中国今日已是一个初步工业化的社会，而早已不再是典型的农业国（数据资料详后）

第二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虽然存在社会分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既不存在真正君主制，也并不存在建立于地产所有制上的贵

M. bloch, Feudal Society. P. 149.

② 参阅马克尧《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族阶级和人身连带。

因此用‘封建’这个概念来描述今日中国的社会性质除了纯粹谩骂的意义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出能够具有丝毫的适用性。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主张‘现代封建论’者还把这一论点扩及于世界社会主义现象的领域。有论者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实质，也属于一种‘东方封建主义’的复活现象。因而论者不但否认1917年2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的意义，也根本否认“十月革命”具有任何肯定的历史成果，甚至彻底否认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果（对这一成果就连西方学者也不会全盘否认），在主张‘社会主义是现代封建制度’的理论家看来，20世纪‘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实质都乃是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复活，并不具有推进人类历史的任何意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则更常被他们比附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蒙昧主义和迷信思潮”，据说与近代科学精神也是不大相容的。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人宣称“20世纪社会主义的试验是人类史上一个悲惨的失败”。根据这一理论，他们才大谈‘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们认为这种改革的实质就是在思想文化上要进行‘启蒙’和重新‘反封建’，在经济上要通过私有化运动进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补课”，在社会上要构造一个“中产阶级”即新资产阶级，而在政治上则必须重新进行模仿美国政体的“民主革命”。

应当指出，现代反封建论者的这一套理论，并非凭空而来的，而是既系统化，又具有相当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的。一方面，论者依托于西方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势力的精神和政治支持。另一方面，论者又充分利用着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7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立40年来的全部失误、挫折，特别是利用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都至今依然贫穷、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无可否认的现实。更重要的是，论者还利用着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理

论上的迷惘，利用他们对当代西方社会情况和意识形态的不熟悉，也利用他们在反驳论敌时，往往只是主观地宣判敌对理论是完全的错误的，却并不总能辩证地、令人民群众普遍信服地回答敌对理论的全部挑战。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呢？

社会主义的批判者曾指责说：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以无数人的鲜血和尸体来建造天国。但是论者却忘记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构造起点，西方多数史家都公认开始于 16 世纪。而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那是欧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世纪。那也是欧洲“中产阶级”开始掌权的世纪。但那又是一个海盗兵舰在东方黄金梦的鼓舞下从事地理发现，从事殖民掠夺，贩卖黑奴，进行宗教战争和异教徒屠杀，布满鲜血和战火的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开始并不是甜蜜蜜地从中世纪的农业田园诗中静谧、优美、和谐地诞生的。

同样 如果一定要让中国抛弃 40 年来已经取得的一切经济成果和社会成果，重新进入实现私有制的原始积累和“构造中产阶级”的历史起点上去，中国人民就必须准备再经历也许需要几十年、牺牲几代人的动乱和内战。在这一意义上，己巳 1989 年动乱中的血与火，已经对中国人民发出了最明白无误的警号。

当论者指责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政治专制走向封建复辟的时候，这些论者似乎却不知道英国在 17 世纪 1649 年的“中产阶级革命”后，出现过革命领袖克伦威尔的独裁，后来又有斯图亚特王朝（1660 年）的王政复辟，并且从此以后一直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实际上，对中国若实验资本主义所必经的这一前途，某些“精英”也是很清楚的。令人惊讶的只是他们面对这一前途所表现的那种异常冷静和冷酷。我曾经亲耳听到在某次会议上某“精英”的一种宏论：“为了历史的进步和子孙后代走上富裕文明之路，即使在原始积累时期死掉几亿人也可以在所不惜。中国人本来就太多了！这样还可以减弱大批低素质人口的包袱，实现马尔萨斯的建议！……”但是问题是，中国的普通人民愿意接受和进入这种冷酷的淘汰吗？

至今。但西方史家却从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封建制度的复归。这种现象，也并未妨碍英国在当时和后来作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而称霸世界。

而在此次动乱中被刻意模仿和照搬试验的 1789 年法国革命，在当年的历史现实中也决非真如仙山琼阁般的美妙！虽然“人权宣言”的确是在这一革命中颁布的。但如果真的用西方“人权”的标准去衡量，这个革命本身在某些方面恰恰就是反人权的——在雅各宾激进派专政的 1792 至 1793 年期间，曾处死了成千上万的持不同政见者（据说革命的断头台上至少处决了 2 万人）因此史家称其为“恐怖统治时期”<sup>①</sup>。对其功过 西方史家至今仍然还是褒贬不一。同时 在被中国“新启蒙派”看作“中产阶级革命”典范的这样板中，先建立了皇帝拿破仑的独裁君主制度（据记载，他也处决了至少 40 万人以上的政治反对派），而在拿破仑失败后，又发生了革命前王朝波旁家族的真正复辟。但西方史家也并无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或者认为拿破仑现象和波旁王朝复辟是封建制度的复活。更重要的是，尽管有这一切，法国人仍然把被当时许多欧洲人看作“暴君”、“杀人魔王”的拿破仑，尊奉为“伟大的民族英雄”。

就是到了 20 世纪，在已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意大利和经济高度现代化的德国，也仍然曾出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极权专制现象。然而西方却也没有史家认为这是属于一种“封建主义复归”的政治现象。

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在其 4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经历无数的曲折、错误、磨难、失败，可以实行多次的血腥屠杀和镇压，可以出现多种多样的极权人物、“铁血”人物，但资本主义制度却仍被认为始终是和永远是“人权”和“民主”的最高典范，而作为一种

<sup>①</sup> E. M. Burns, 《世界文明史》第 3 卷 第 33 页。

新制度的社会主义，尽管其历史还不到 100 年 尽管相比较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发展道路（例如 与 16 世纪开拓新大陆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比，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政治制度比，与英国和美国 19 世纪工业化前期的经济不公正比），20 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道德、人道、社会公正、经济公正和改造人性上的优势 都是极其明显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却不能容忍社会主义政治民主需要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不能容忍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需要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一有挫折和失误，就被认为它是应该立即被全盘否定和推翻呢？

上述问题实在值得深思。

至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常被某些论者比附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蒙昧思潮”，而认为与近代科学精神大不相容的问题 也是值得分析的。

有趣的是 当论者贬抑马克思主义为宗教时 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近年在中国思想界大受一些“精英”青睐的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的理论。韦伯曾以毕生精力研究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他看来，好的宗教伦理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名著。他认为 英国人于 17、18 世纪普遍信奉的加尔文派基督教新教伦理，对于促进英国工业化具有密切关系。通常人们认为 近代科学精神、工业文明（即现代化）与宗教精神是不相容的。但韦伯却认为，正是加尔文新教的清教徒精神、献身神圣使命、自我克制的禁欲主义精神，对于近代荷兰、英、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推进作用。他说：“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赋职责为基础的合理性行为 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这种宗教精神是如此重要 以至在韦伯看来，近代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工业化而近代东方则未能，原因就在于西方基督教新教具有此种献身精神，而东方传统

宗教则缺乏这种精神。韦伯没有看到 50 年代的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充满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禁欲献身精神——并且无疑地对当时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给予了积极的作用。）韦伯的历史观点，实际是一种宗教决定论的唯心历史观，我们不必赞同。但是，当近年一些论者肆意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禁欲主义的准宗教”，批判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中倡导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为人类献身的精神是宗教精神时，那么考虑一下韦伯的上述观点，不也是十分发人深思的吗？！

## 7 中西方经济发展之比较

研究各国现代化历史的国外学者曾注意到，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一般必须完成三个步骤：

一、进行民族革命 形成主权独立的国家。

二、进行社会革命 亦称“国民(Nation)革命”。通过这一革命提高人民地位，使人民由封建时代的子民、臣民上升为国民、公民。其根本目标，则是创造某些制度和文化环境，借以开发民智、调动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在科学技术的引导下推进工业革命，最终实现经济、文化的高速起飞。

以此来观察 1949 年中国革命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一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彻底解决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说，排除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凌辱，使中国具备了建立自身工业体系和市场，谋求民族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又通过这一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解放并且重新塑造了人。革命也的确解放了生产力，推进了 40 年来工业、农业、科技领域轰轰烈烈的蓬勃发展。